

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建設性作用

□延靜

【中外連線】

聯合國安理會23日就朝鮮發射衛星事一致通過2087號決議，要求朝鮮遵守安理會有關決議規定，不得再使用彈道導彈技術進行發射。決議同時重申，希望尋求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決有關問題，呼籲重啓六方會談。這是經過一個多月艱苦磋商取得的結果，中國在磋商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朝鮮問題是歷史上形成的，它牽涉到有關國家的利益，十分複雜敏感。回顧歷史可知，地處東北亞要衝的朝鮮半島，一旦發生事端，特別是兵戎相見，對各方都會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中國一貫主張朝鮮半島實現和平穩定，從根本上講就是這個原因。

採取平衡適度原則

爲了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穩定，中國幾十年來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遠一點說，朝鮮停戰之後，1958年中國人民志願軍主動撤出朝鮮，就是爲了這個目標。而美國在韓國至今留有駐軍。近一點說，1992年中國與韓國雖然國家體制不同，經過談判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也是爲了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中國本來還從中斡旋，希望美國和朝鮮改善關係以至建交，也是爲了更有利於這個地區的形勢朝着和平與穩定方向發展。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朝鮮半島出現核問題，形勢更加複雜。於是本世紀初，爲了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中國倡導中國、美國、朝鮮、韓國、日本、俄羅斯舉行六方會談，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問題。這也是中國歷來主張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立場的體現。上世紀末，中國就曾參加中國、美國、朝鮮、韓國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四方會談。在六方會談中，中國作爲主席國不遺餘力盡了自己的責任，同時促使朝美雙方接觸對話，化解猜忌，增加互信。六方會談曾取得重要進展，各方就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達成一些原則協議，可惜其後又因各方主張相左而導致會談中斷至今。這使本來脆弱的半島局勢更加不穩定。

當前，維持朝鮮半島局勢穩定，避免發生任何事端，具有十分重要性。每當矛盾激化之時，中國呼籲各方冷靜對待，不可失去理智，正是出於這一立場。中國對朝鮮研製核武器一貫持反對立場。早在2006年朝鮮進行第一次核試驗時，中國就發表外交部聲明，指出朝鮮無視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悍然實施核試驗，中國堅決反對。2009年朝鮮進行第二次核試驗，中國不僅明確反對，還參與聯合國安理會的有關討論，支持通過決議對朝鮮進行制裁。

中國反對任何一方激化朝鮮半島局勢的立場堅定不移。去年12月朝鮮宣布將發射衛星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表明，朝鮮有和平利用外空的權利，但它受到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的限制。去年12月12日朝鮮發射衛星後，中國對朝鮮不顧國際社會普遍表明關切仍實施發射表示遺憾，同時指出安理會的反應要慎重、適度，應有利於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大局，避免局勢輪番升級。在安理會磋商中，中國代表本着平衡、適度這個原則，盡了我們的責任和努力。

大局為重都不偏袒

中國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一貫以大局爲重，國際上有時有人認爲中國偏袒某一方，其實這完全是誤解。中國需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包括朝鮮半島南北方在內的有關各方，也都需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失去控制，發生事端，對各方都沒有好處，甚至帶來嚴重後果。東北亞乃至亞洲各國，也都希望這一地區局勢和平穩定，以利各自國家的發展繁榮。這就是中國主張早日恢復六方會談，通過對話協商和外交努力解決朝鮮半島問題根本原因所在。這次聯合國安理會就朝鮮發射衛星事通過決議，對朝鮮來說是一個嚴重的警示，對各方來說是一個冷靜平衡的舉動，更重要的是，它昭示早日重啓六方會談的重要性，它是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實現和平穩定的有效途徑。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有話要說】

政府千方百計紓解房荒

□黃山松

特首梁振英及其他的管治團隊，把紓緩市民對房屋的需求列爲施政重中之重，置於議事日程中的重要事項，十分了解和樂於傾聽市民的心聲。

從梁振英提出競選政綱到他正式出任特首以來，於談論的施政理念中，都離不開有關市民最關心的住屋問題，可見香港真是到了一屋難求的景況。於現今表面現象看來，香港早已超越「廣廈千萬間」幾千萬倍之計，但偏偏存在那麼多見不得光的無瓦遮頭的不幸一族。這不幸的一族，身無居所，更諷刺的是即使有得賺取一瓦遮頭避風雨的，卻是住在非人可住的擠迫環境、衛生極為惡劣的地方，有被稱爲紙皮屋、劏房、棺材房、板間房、廁蓋頂，甚至作打游擊式於24小時營業的「7．11」及麥記樓身，諺稱爲「快餐難民」。這種形形色色的自尋棲身之所的不幸者，近些年來人數有增無減。歸歸樓價高，供應不足，想住屋，買不起樓，平價樓一屋難求，再加上低收入捉襟見肘，搵錢食三餐都難以爲繼，那有餘錢可作買樓之用。有頭髮又有誰人甘願作癩痢，自取無趣，完全是身不由己，十分無奈、無助。

目前，特區政府正竭盡所能，以寸土必爭的決心，千方百計尋找可建屋的土地起樓，盡快滿足市民的住屋需求。每年爭取有兩萬的公私營新樓推出市面供應，讓市民選購入住，紓緩屋荒。相信在未來幾年，緊張局面會大爲改善。但從尋得適合建屋土地到起樓落成，這過程並非即食麵那麼簡單，沒三五年時間是不成的，在不能一蹴而就的實際環境底下，唯有耐心的等待機會降臨。

可以肯定，要等超過三年以上才有希望上得政府提供的公屋居屋。大家試想一想，此類公共房屋申請人數多達二十萬，而一年最多只能提供兩萬個單位，在僧多粥少情況下，說句一味得個「等」字並非言過其實，尤其政府提供給申請者作申請的公屋居屋是有區分先後緩急的，先照顧年紀大的一族。年輕力壯者，來日方長，機會隨時在向你們招手，應該加強自信心，自力更生，靠自己。尤其有不少剛離開大專校門的學兒學妹，實在不必那麼快加入爭買屋上樓之列，應把方便留給更急需的人。

用發展眼光看北區問題

□崔 寧

【港事港心】

最近在與深圳接壤的香港北部區域，出現了「搶學位」與「水貨客」捲土重來現象，吸引了社會注意力。先是適齡兒童家長排長龍，爭先恐後地爲子女可以「原區派位」入讀該區的學校而「搶學位」。此後，又有新聞說，年關將至，上水等傳統「水貨客」活躍的地方又活躍起來。爲此，有網民聲言要發起激烈抗爭行動，一些激進政黨還聲言將「繼續組織光復行動自救」，甚至要求特區政府爭取取消「一簽多行」政策。

社會重心逐漸北移

「搶學位」和「水貨客」捲土重來，這兩個現象，客觀地說，是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尤其是兩地經濟融合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可以說是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因兩地文化、制度和生活乃至習慣差異而產生的副產品，並非主流。對待這些問題，香港社會應該有一個冷靜客觀的態度，實事求是分析問題，配合政府採取化解矛盾的措施，才是解決之道。那種不分清是非曲直，有意將問題擴大化，鼓動市民以激進手法進行抗爭的做法，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這樣做，不僅不利於矛盾化解，反而會激化矛盾，使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受到傷害。

近年來香港北區的問題頻生，其實恰恰是香港社會重心向北位移趨勢的一種表現。對社會總體發展而言，只要市民能夠正確認識問題的本質，政府能及時地對這種趨勢加以引導並使各項政策及時跟進，完全可以避免矛盾和問題擴大化，消弭這個趨勢帶來的消極因素。

一些人認爲，北區出現「搶學位」亂象，是纏

繞香港社會已久的「雙非」問題帶來的苦果，一些人甚至用「10.5萬跨境學童隨時殺到」這樣不負責任的說法來製造恐慌。這些都不是客觀、理性分析問題的態度。跨境學童的來源應當弄清楚，這樣解決「搶學位」問題才會更科學更有效。何以在人口密集之處的南區，中小學擔憂「殺校」，紛紛要求「小班教學」的時候，北區卻「一位難求」，除了「雙非」因素影響外，相信與越來越多港人在內地安家落戶不無關係。

「搶學位」涉及「雙非」家庭的數量估計還是少數，其中很大一部分相信其父母雙方至少有一個是香港的永久居民。這些人屬於在深圳或內地其他地方居住的香港家庭。這並非沒有依據的臆測。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幾年前的統計，居內地港人和跨境家庭人數約爲八十三萬人。政府不久前估計，香港人在內地長期工作的人數以十萬計。統計資料亦顯示，每年港人在內地置業都有一萬多宗，深圳是港人最愛的內地置業城市，約佔整體四分之一。尤其是有不少香港居民在深圳居住，每天往返香港工作，形成跨境家庭，其子女的跨境學習自然會選擇就近的香港北區。

由此可見，將「搶學位」現象一味地與「雙非」問題掛鉤，是不科學也不合理的。社會必須正視香港人口的變遷，而政府更應適時調整不同區域的發展策略，以適應這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在目前情況下，加快北區的規劃發展，解決迫在眉睫的建設學校問題，便是政府的不二選擇。

「水貨客」問題就比較複雜，但這並不可怕。對這個問題也要仔細分析。它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從一個側面表明，北部區域正在形成一個貨物的集散中心，儘管內地「水貨客」行爲屬於非法。有資料顯示，在成千上萬的「水貨客」中，即有內地來港者，亦有香港本地居民，一些估計甚至說，港人

佔了六成。「水貨客」出現與存在，實際上是兩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兩地政府都在採取有效的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和阻止，要完全斷絕不可能，亦需要一個過程。近日，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梁偉發表示，在打擊水貨客問題上，國家有法律規定。他認爲，內地與香港在這方面合作得非常好，希望港人放心。

開發建設化解矛盾

發生在北區的「搶學位」和「水貨客」現象，並不是兩地經濟融合中必然出現的問題，通過完善施政完全可以解決。例如，早前梁振英政府已經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中止了深圳非戶籍居民可「一簽多行」的政策，而「雙非」子女的難題也正在克服，目前數量已明顯減少了。有一點非常重要，兩個問題的出現，關鍵在於內地經濟，尤其是深圳經濟的發展，兩地融合趨勢使香港北區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因此，既要解決北區當前急切的問題，更要

用發展眼光看待北區的問題。只有順應這個變化，完善各種配套政策和逐步增加資源，而不是光堵不疏，才能緩解矛盾，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促進香港社會整體發展。

人們注意到，在梁振英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到要求各駐內地辦事處提升職能，其中一項新任務就是「擴大政策調研，加強收集內地港人的數據，了解生活情況和服務需求，並分析全國性政策爲港人帶來的機遇和影響」。

香港北部區域出現的問題，是香港社會整體發展不可避免的，是社會重心逐漸北移趨勢使然。可喜的是，政府正在下決心根本解決問題。日前，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將這個區域的開發作爲長遠土地供應的規劃，已清晰展現出來。

審慎選擇香港政改路徑

□周八駿

今天香港政治情況距離普選所要求的條件尚有明顯差距，這就是香港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普遍缺乏現代政治應具備的能力和情操。梁振英及管治班子不能因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香港政治存在着結構性缺失而懈怠管治施政。香港社會必須深思，在存在着上述各種明顯缺失的條件下，選擇怎樣的政改路徑？

【知微篇】



周八駿

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沒有將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列入2013年特區議程，反對派對此表示強烈不滿是意料中事。我已撰文說明過爲何2013年不應討論政改議題的道理，這裡補充說明：與其陷入無謂的爭拗，不如冷靜深入地思考香港民主政制的路徑。

「路徑」以「目標」即普選模式爲前提，指的是實現目標的「過程」。從2006年以來，香港社會關於香港普選模式的討論是存在着明顯分歧的，相應地，關於實現目標的「路徑」也存在着明顯分歧。

本文撇開「目標」不論而專談「路徑」，是因爲最近即使與反對派關於普選模式的看法相同或相近者，也開始質疑反對派所普遍主張的「路徑」。

反對派追求西方模式

反對派所追求的是西方政治模式。在這一點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黃偉豪所發表的關於香港政改的一系列文字沒有異義。值得注意的是，他日前在《明報》發表《CY下台之後——香港民主化的第二度危機》一文中指出：即使「中央容許我們普選特首，新產生的民選政府是否有足夠的管治能力，駕馭香港多元和複雜的形勢，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他間接引述英國BBC一位記者對香港政治的觀察稱：香港的參政者缺乏「無私、勇氣和奉獻」。他擔心「很多爭取民主的人士，過分相信香港所面對的種

種問題，均可在實行民主後迎刃而解，而忽視了提升管治能力這一重要的一環，造成香港民主運動破多於立的局面，爲日後的民主政府是否有足夠能力執政，鞏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憂慮。」

黃偉豪的文章表明，只要面向香港政治實際而不是關在理論的象牙塔裡，那麼，是能夠發現今天香港政治情況距離普選所要求的條件尚有明顯差距，這就是香港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普遍缺乏現代政治應具備的能力和情操。在這一點上，我與黃偉豪有同感。

最近，我反覆指出，香港長期是一個商業城市，視從政如經商者，比比皆是。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反中央反特區政府之所以表現得十分勇猛，是因為沒有政治風險。如果有政治風險，那麼，相當一部分人是會畏縮的。

容易陷入結構性危機

黃偉豪擔心香港現有政治人才是否足以配備一個有效管治的民主政府。其實，環顧全球，即使擁有豐富政治人才的、歐盟和日本，今天，其政治體制亦即香港反對派和不少人士心嚮往之的民主政制，都已陷入結構性危機。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2011年7月30日至8月5日第400卷第8744期以《轉向日本人——債務、違約和西方新政治癱瘓》爲封面專題，指出：從日本到歐洲到美國，政黨及政客們以爭取選票上台執政爲首要目標，不可能爲國家整體和長遠利益制訂並推行具遠見卓識的政策，導致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引發金融經濟社會等結構性危機；又同樣因爲以選票和執政爲至高無上的目標，無法對解決結構性問題、克服結構性危機制訂並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經濟學人》周刊2013年1月5日至11日第406卷第8817期又以《美國轉向歐洲人——破裂的制度

、卑鄙的交易且看不到出路》爲封面專題，分析了當前美國、歐盟政治體制運作相似的問題。一是政策只能「打補丁」，二是利益小集團的影響太大，三是政客們不能兌現對選民的承諾。歐盟和歐元集團的政黨和政治領袖們對待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及相關結構性問題是如此，美國兩黨對待美國國債及相關結構性問題亦如此。

履行競選承諾更重要

從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以來，香港社會關注政治人物的誠信，但是，將太多注意力投向政治人物在家庭婚姻、住宅僱建等事情上所反映的個人操守，沒有給予政治人物是否或能否履行競選承諾以足夠重視。事實是，政治領袖個人品行固然重要，相比較，是否或能否履行競選承諾更重要。

從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以來，香港社會開始注意「大利益集團」譬如所謂「地產霸權」（按：筆者只是借用這一稱謂，但不同意）對於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的太大影響，但是，沒有深入分析「大利益集團」內部的細分，以及其他目前看來不大的利益集團正在形成並對特區政府管治施政產生影響。

從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以來，香港社會人心思變，以強調「變」的一方在競選過程中後來居上，但是，對「變」的性質和困難，以及任何可能組成的管治班子團隊的能力，均缺乏應有的認識。梁振英在當選前後，尤其就職以後民意支持度明顯落差，在頗大程度上與之相關。

誠然，梁振英及管治班子不能因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香港政治存在着結構性缺失而懈怠管治施政。香港社會則必須深思，在存在着上述各種明顯缺失的條件下，選擇怎樣的政改路徑？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奧巴馬面對分裂的美國

□陶文釗



陶文釗

【國際視角】

1月21日，奧巴馬總統開始了第二任期。因爲2月12日他還要作《國情咨文》，所以這次就職演說就比較簡短，不到20分鐘。但內容卻涉及甚廣，從先輩的傳統到理想、價值觀，從維護美國人的個人自由到在世界上推廣民主，從壯大中產階級到男女平等、同性戀者的權利，從內政到外交，可以說面面俱到，應有盡有。但是具體問題則點到爲止，不加闡述。這個就職演說就像一個提綱。從總體上說，他第二任期的主要挑戰仍然是復興經濟。

主要挑戰仍是復興經濟

美國現在面臨的問題與歐盟大同小異。爲了把超過16萬億美元的債務減下來，必須削減政府開支，包括國防費用、社會保障等；同時增加稅收；但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導致社會購買力壓縮、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這也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財政懸崖」。前些時候政府與國會達成臨時妥協，但「懸崖」沒有過去。16.4萬億的債務上限馬上就到期了，奧巴馬政府要求提高上限，與國會，主要是與共和黨控制的衆議院，又有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

美國經濟現在面臨困難，但美國還是一個有底

氣的國家，科學技術的核心競爭力就是這種底氣的主要組成部分。奧巴馬政府很清楚，要使美國經濟重振雄風，保持和加強這種競爭力是必不可少的。他在演說中強調，美國不會把那種可以創造新的工作和新的行業的技術讓給別的國家，美國必須獨領風騷。

現在奧巴馬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美國社會的分裂，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黨爭。伊拉克戰爭分裂了美國社會，奧巴馬的醫保改革使這種分裂加深，在許多問題上，如上面提到的「財政懸崖」、應對氣候變化、移民政策改革、社會保障等重大問題上，美國社會都沒有達成共識。奧巴馬政府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演說中雖然沒有用聯合與共和黨的分歧這樣的表述，但他至少重複了五次「我們一起」，「我們一起，像一個國家，一個人民」，可見他是很強調這一點的。奧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可以取得的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黨合作的程度。

在外交方面，他沒有提到具體的問題，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名字。但他闡述了他的理念，那就是要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美國與別國之間的分歧，這不是美國對面臨的危險表現幼稚，而是因爲接觸可以更快地消除國家之間的疑慮和擔心。這段話的言辭說得不錯，說明了他不會再借錢貿然發動一場中東戰爭，說明了他會努力尋求包括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等緊迫問題在內的國際糾紛的和平解決。對此應該表示歡迎。

奧巴馬現在選定的重要閣員似乎也說明了這一

點。國務卿的人選克里、國防部長候選人哈格爾、中央情報局局長候選人布雷南都不是那種激進的保守派人士，尤其不是新保守主義者。他們都是資格很老、經驗豐富、比較溫和務實的人。這個外交—安全團隊應該奉行一種更加務實、更強調國際合作、尤其是大國合作的外交政策。

合作仍是中美關係主流

對於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中美關係可以有什麼樣的期待呢？奧巴馬政府在第一任期宣布了戰略重心的東移，第二任期肯定是要繼續下去的。這種戰略調整已經給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增加了複雜因素，給中國的周邊環境帶來了負面影響。在奧巴馬頭一任期的後三年中，兩國關係中的競爭性因素明顯增強。正是針對着這種情況，中方提出了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命題，目的就是要避免以往國際關係歷史上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由競爭而走向衝突的那種大國政治的悲劇。美方也作出了回應。

經濟全球化使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如此之深，合則兩利、鬥則兩傷成了一條鐵律，兩國合作能帶給兩國巨大的利益，而兩國關係惡化的成本卻會非常高，以至中美誰也承擔不起。接下來的四年中，兩國關係將仍然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關係，但筆者相信，合作將仍然是兩國關係的主流，兩國關係會朝着新型大國關係艱難前進。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